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文学本土化 探索的新进路

——以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彭岚嘉 郝婷

**摘要：**近年来，长篇小说在主题意涵、语言形态和文体变革等方面形成回归本土化的创作趋向，成为文学领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具体体现为作家们不仅在主题意涵层面通过重述历史和观照现实对本土化经验进行拓展和深化，而且还在语言表达方面通过借鉴本土话语资源以恢复汉语表述方式在表现国人情感结构和文化心理方面的独特修辞作用，同时也在文体结构方面通过对中国本土性小说传统的传承与赓续，积极探寻文体革新。这一回归本土化的创作趋向，是全球化语境、中国式现代化等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学自身寻求原创性突破共同促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本土化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题材同质化、处理方式简单化、人物塑造贫乏和超越性缺乏等问题。对此，作家们需要在更加深入生活、更新经验和认知方式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把握中国本土现实的新变，将关注的焦点拓展到与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从多方面借鉴中国本土性传统，塑造出更多具有人性深度和彰显本土文化精神的典型人物，并以超越性视野和未来意识关注全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精神难题。与此同时，本土化文学应更新对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认知，以现代意识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一种本土化的方式通达“世界性”，彰显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文学本土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故事；汉语主体性；文体革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4）03—0152—10

何谓文学本土化？尽管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努力切近中国本土现实和建构中国话语主体性的角度来说，本土化主要指中国文学在回归本土文化传统和切近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以符合国人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的话语表述方式，讲述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凝聚着国人独特生命体验的中国故事，同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主体性。也就是说，文学本土化强调的是作家的创作与本土现实和文化的关联。对此，贺仲明指出，“文学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看其关联是否密切，能否体现出本土的深刻和独特，能否以独特深度和个性呈现其意义”<sup>①</sup>。

具体到近年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文学的本土化实践主要表现为：作家们力图回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鲜活的社会实践的现场，从宽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视野书写铭刻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经验的中国故事，

**作者简介：**彭岚嘉，男，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西部文学研究。

郝婷，女，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sup>①</sup> 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进而“与‘在地’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与情感结构等建立对话关系”<sup>①</sup>。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乔叶的《宝水》、葛亮的《燕食记》、王跃文的《家山》、胡学文的《有生》、叶舟的《凉州十八拍》、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邵丽的《金枝》、鲁敏的《金色河流》、罗伟章的《谁在敲门》、付秀莹的《野望》、魏微的《烟霞里》以及周瑄璞的《芬芳》等是其中的代表。

这一回归本土化的创作趋向，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学反思外来思想和重审本土文化资源的自觉转向，也是中国作家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势，以建构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与独创性的积极尝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应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以长篇小说创作本土化为代表的当代文学，在传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时，在艺术策略上呈现出何种特点？其以美学表意形式切近中国本土现实和抵达文化精神时又如何体现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有何限度？如何发掘未来文学本土化的发展方向？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予以阐释。

## 一、在历史与现实的整体认知中拓展本土经验

在审视历史的基础上重建文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是实现文学本土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贺仲明指出：“讨论文学的本土性，首先必须讨论文学的目的。”<sup>②</sup>究其原因在于，很大程度上，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实践在初始阶段都要面临“文学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只有首先明确目的，文学才能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文学本土化之所以被当作“当下文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之一”<sup>③</sup>，就是因为它肩负着“为本民族和现实时代写作”的重要使命，同时通过对中国本土生活的关注和对中华文化个性的把握，反拨此前文学对本土生活的疏离以及过于“西方化”的色彩。由此，厘清当下本民族所处的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文学与本土生活的密切联系，深入到当下时代人们的深层精神世界，成为文学具有本土意识的根本所系。

### （一）本土经验拓展的三个面向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百年来的现代化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在此过程中民族精神的蜕变，无疑是最能反映中国本土社会生活和体现国人精神景观的参照物。可以说，近年长篇小说在主题意涵层面的本土化探索，正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故事的书写和对民族心灵变迁史的呈现，不仅在历史的来路中实现对本土现实的整体认识和对本土文化精神的深入理解，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重建积累了经验。

其一，在主题意涵层面，通过重返中国革命的复杂现场同时立足于现实，重释当下本土生活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历史必然性。有论者指出，“革命”一词是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只有以革命为底色来把握‘现代中国’，才能深描出‘现代中国’所特有的‘现代性’的历史意涵”<sup>④</sup>。不仅如此，只有理解革命的逻辑，才能理解个体生命在面临诸如个人与集体、私人与公共、欲望与理想等艰难选择时，何以不约而同地选择牺牲前者成全后者，形成集体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近年涌现出的长篇小说，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王跃文的《家山》、胡学文的《有生》、叶舟的《凉州十八拍》、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作家们力图在具象化的生活中重新理解革命与战争，以此来呈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探索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过程。比如，《千里江山图》对革命复杂性的关注和对革命者为了民族事业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高贵品性的认同，寄寓着作家对人民高于个体理念的当代性诠释以及对市场经济时代崇高精神部分失落的反思。《家山》对中国民众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赞扬和对乡土民众自觉加入乡村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认可，不

① 贺桂梅：《“中国”视野与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

② 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2页。

③ 韩伟、赵婉彤：《文学本土化：现实诉求与理论创新》，《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④ 董丽敏：《以“延安文艺”为方法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2期。

仅还原了个人与历史积极互动的过程，同时包含着作家对家国同构的中华文化精神的褒扬。不难看出，这类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历史和现代化探索实践的书写，迥异于“新历史主义”小说对革命、历史、集体和人民等宏大话语的解构，其间凸显的不仅是作家们试图在个人与历史的连接中把握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努力，更暗含着作家们力图在中国革命发生的鲜活场域和现代化实践的历史逻辑中，重新理解中国在现代化探索道路中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文化心理。

其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探索经验。近年本土化文学实践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道路的回溯，意在呈现中国寻求现代复兴之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揭示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欲求以及情感和心灵上的悸动。在这个意义上，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邵丽的《金枝》、鲁敏的《金色河流》、魏微的《烟霞里》等作品，共同建构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探寻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镜像，唤起了中国人对凝聚着民族情感和集体记忆的“近历史”的重返和对一代人有一代人之现代化使命的体认。比如，《烟霞里》对不同代际面临的相异的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凝聚着作家对中国现代化探索经验与教训的思考。《金色河流》对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财富的丰富给当代中国民众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嬗变的观照，凸显出本土化文学对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实践的重视。《雪山大地》则深入把握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教育、医疗、经济、生态等层面的现代化实践，既揭示出汉藏两个民族建立现代文明生活和实现民族融合的艰难历程，又传达了跨越城乡差别、民族差别和东西南北差异，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打破物质与精神的割裂，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追求。

其三，热切回应时代主题和关怀社会现实问题，及时呈现现阶段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探索实践中的困惑与成就，同时以独特的人物形象彰显时代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sup>①</sup>。就此而言，乔叶的《宝水》、罗伟章的《谁在敲门》、王松的《热雪》等作品，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家以本土化现实题材参与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实践的积极性尝试。比如，《热雪》对乡村集体经济和文化振兴问题的探讨，《白洋淀上》对白洋淀新区建设历程和发展之路的聚焦，《谁在敲门》对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和乡村脱贫问题的关注，都可看出作家们力图以文学方式参与现实变革的努力。再如，《宝水》不仅回应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社会的伦理重建和文化保护等问题，还重新发现乡村的正向价值，为新时代的新型城乡融合和现代人的精神疗愈提供了可能。此外，《谁在敲门》和《宝水》等小说还塑造了独特的新时代乡村主任形象以及此前从未有过的乡建专家形象，从中人们可以“通过当下和过去人物的对比观照，了解不同时代的感情特征和思维特性，进而了解时代、了解民族、了解历史、了解自己”<sup>②</sup>。

## （二）深入本土化经验的多重动因

从总体上看，近年长篇小说在主题意涵向度上所表现出的本土化创作趋向，与时代语境变迁、文化价值诉求变化和文学观念变革等要素密切相关。具体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同质化以及渗透其间的帝国审美心态和价值观念的警惕与省思。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是互动并行的。但由于一些西方强势国家，“尤其是美国打着文化普遍主义的旗号，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肆意地渗透和入侵到其他民族文化当中”<sup>③</sup>，致使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文明面临着文化同质化的危险。对此，新马克思主义者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化霸权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遭到破坏，使“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造”<sup>④</sup>。面对这种情况，国内思想理论界开始了自我反思和探索新路的努力。从本土性出发观照本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4页。

② 莫言、梁晓声、施战军、刘庆邦等：《让更多国外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学的魅力》，《文艺报》2023年9月18日。

③ 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④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5页。



土现代经验和挖掘民族文化精神，越来越成为共识。近年来文学领域涌现的讲述中国独特的现代化探索经验的长篇小说，正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知识阶层本土意识觉醒的体现。这些立足于本土生活且具有浓郁本土意识的小说，传达的集体主义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个人与时代密切相连的思想以及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现代发展理论，不仅是对西方美学与政治、生活与想象相割裂的弥合，同时也是对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纠偏。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等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召唤。近年来中国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新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范式。在此之前，思想理论界曾试图建构多元现代性、内生现代性和别现代主义等理论话语，反思强调“断裂”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的遮蔽和化约。但这些理论均无法有效阐释中国的社会状况、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未能从整体上揭示中国现代化探索经验的独特性，亦无法建立起广为接受的新的认知世界的思想范式。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概念，无疑为认识中国和阐释中国独特现代化经验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与强调断裂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历史和实践的连续性、广延性和整体性。在这样的思想共识下，将中国强烈的社会变革和曾被误指为“另类现代性”的革命实践，整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经验中，建构起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完整性和历史的连续性，成为近年文学本土化呈现百年探索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过程性、动态性和生成性的深层动因。

最后，宏大叙事与史诗性现实主义的复归与纵深发展。受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个人写作”和“身体写作”开始，中国小说界开始流行微小化、琐碎化、个人化的叙事潮流。这与一些作家试图以关注个体生存的方式剥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有关。但这些作家在放大日常化、琐碎化的私人经验的同时，未能平衡好私人与公共、个人与时代、微小与宏大之间的关系，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失去社会承担功能，招致读者对文学是否还有能力对现实发声的质疑。针对这一危机，近年来本土长篇小说的写作开始脱离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羁绊，致力于书写以“本质性、总体性、思辨性、历史深度”<sup>①</sup>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以克服小说领域私人化叙事和日常化叙事关注视野过于狭隘的局限。在此基础上，近年长篇小说呈现出重建史诗性的广义宏大叙事风貌。究其原因在于，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作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能够以艺术的方式去回应现实问题，深入理解和把握时代的情感特征与精神图景。于是，强调总体性、历史整全性的宏大叙事逐渐成为作家们把握时代精神的不二选择。因此，近年长篇小说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无一例外地以宏大叙事的气势，雄心勃勃地试图以‘史诗性’来完成对时代、社会和文学的致敬”<sup>②</sup>，而且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作家们试图以宏大叙事总结20世纪中国历史道路和现代化经验的文学理想。

## 二、本土话语资源的采撷与小说语言本土化的探索

文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和审美现象，它既关联着独特的本土化经验，又依存于特定的语言形态之中。这就意味着，对近年长篇小说创作本土化趋向的考察，还应扩展到探讨这种本土化策略在语言层面呈现出的形态，以及本土化写作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个人及群体“身份认同第一基本要素”<sup>③</sup>，不仅关联着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本土写作对汉语主体性的追求，更关系到个人和群体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从总体上看，近年长篇小说在语言层面的本土化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将方言、民谚和熟语等活态的散白语言融入小说叙事中，以呈现中国人的生活情态和精神气质。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方言俗语的角度来探索文学的本土化和建构现代汉语的主体性，以及

① 王金胜、秦菽遥：《作为研究资源、对象和方法的“宏大叙事”》，《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第7期。

② 谢尚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2017—2019年间“50后”作家长篇小说一瞥》，《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6期。

③ 郭恋东：《论中国当代作家的方言写作和身份认同》，《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如何在兼具文学性、地方色彩和现代性的情况下，将贴近民众生活情态和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方言俗语融入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实践中的核心命题之一。近年长篇小说中涌现的将方言、俚谚、熟语融入叙事的现象，显示出了作家竭力建构中国话语的主体诉求。比如，《大地之上》插入齐鲁大地上的“颠倒语”；《燕食记》用正文呈现原生态方言、以脚注为之做注解的方式将方言融入叙事中；《野望》用“芳村这地方”作为引导词，解释融入文学叙述中的方言词汇的意思；《平乐县志》和《苔》塑造一种理解四川方言的语境和氛围；《家山》则不仅采用同义复现和创设语境的方式运用方言土语，还将歇后语与特定人物的行动和故事结合在一起，生动传神地呈现出人物的精神气质；《宝水》以众多在豫北乡村广为流传的“典故”，呈现民间的生活智慧和乡民幽默乐观的精神气质，并将人物处理方言俗语的情感认同机制与乡土认同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这些以方言口语的使用为鲜明特色的长篇小说，体现出作家们从方言角度积极探索文学语言本土化和建构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努力。

其二，在小说叙事中融入民间戏曲、歌谣等充满韵律感和音乐性的文韵语言，以呈现中国民众的生活智慧和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早在 21 世纪初期莫言的《檀香刑》、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中，作家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在小说中融入大量民间戏曲和歌谣，使得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跨媒介效果和拟喻化特征。与此同时，歌曲唱词的嵌入还寄寓着作家们回归中国本土资源和建构中国文学主体性的文学理想。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燕食记》涵纳昆曲、粤曲、“白字戏”；《宝水》融汇婚丧嫁娶、新年祷祝、乔迁新居、日常饮食等方面的乡土民间歌谣唱词；《雪山大地》吸纳了众多藏族歌曲，既传达藏族人民对于自然、生活和爱情的真挚情感，也折射出藏族人民乐观豁达的精神气质以及对社会人生、生老病死的独特理解；鲁敏的《金色河流》通过融入折子戏和昆曲，塑造了一个迷恋昆曲的青年叛逆者形象，昆曲不仅成为父子矛盾的一种表征，而且昆曲的兴衰与人物的精神成长联系在一起，投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和文化自信增强的时代风貌。

其三，借助古典诗词曲赋等典雅的文言文与现代汉语的相互融通，传达中国人的情理意趣和文化心理。学者贺绍俊从“语言性”角度来讨论中国文学的“文学性”重建问题时，倡导将古典文言作为“提升现代汉语文学性和典雅性的最有效的资源”，并指出应“重新认识文言文的文学性，并且应该在现代汉语与文言文之间搭建起更加通畅的大桥”。<sup>①</sup>显然，从具体的文学语言层面探寻中国文学的文学性和独特性，重视古典文学/文化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成了中国文学实现文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之一。近年长篇小说将文言文与现代汉语融合的语言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文学现代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手段。比如，杨怡芬的《离觞》借用古典诗词作为章节名；付秀莹的《野望》引用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古典诗词和月令集解作为篇首语；《家山》呈现对仗工整、合辙押韵的文言句式在气势和韵律上的魅力；《燕食记》不仅小说每章篇名都是极具中国古典文化意蕴的四字句，而且每章还引用诸如《论语·阳货》《十二石山斋丛录》《陶怡云诗序》《闲情偶记》等文言典籍和诗词歌赋作为篇首语。鲁敏的《金色河流》则将汤显祖的《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和张岱的《陶庵梦忆》等古典文言词曲熔铸到小说叙事语言中，不仅有助于小说渲染氛围、展现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建构文化认同，同时也使得小说语言呈现出浓郁的诗化色彩。

语言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背后凝聚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深层的文化精神，是构成个人及群体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点。故而，有论者认为，选择一种语言既是选择一种思维方式，又是选择和认同一种文化身份。<sup>②</sup>可以说，近年来作家们之所以借助方言口语、戏曲歌谣、文言语汇等传统语言形式，探索小说语言的本土化，其深层的文化心理正与建构汉语主体性、创建中国人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认同民族文化精神有关。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李锐、张炜、阎连科、韩少功等作家就开始了这一努力。《受活》《丑行或浪漫》《马桥词典》等方言

① 贺绍俊：《重建文学性先从语言性做起》，《当代文坛》2023 年第 5 期。

② 何平、陈椒帆：《对话：以一种更“本土化”的方式去抵达“世界性”》，《花城》2021 年第 3 期。

小说的出现,集中体现出以“50后”“60后”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话语表达方式的探索。但不无遗憾的是,在年轻的创作者群体的创作中,却一度呈现出了文学语言之本土化韵味弱化的趋向。<sup>①</sup>相比之下,近年长篇小说对于语言本土化探索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50后”“60后”“70后”等一大批作家在自己的新作中积极创建贴合中国民众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的现代语言方式,更重要的是,一度以反叛本土传统姿态凸显独特性的“80后”和“90后”青年作家们,也逐渐转入对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弘扬中来。这批作家立足于中国本土社会现实和文学传统,创作出众多展现母语魅力的小说,积极参与创建彰显汉语主体性和体现国人文化心理的语言表达。这就意味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立足于建立中国话语的主体性立场,从人民鲜活的生活话语场域出发,创建内生于中国本土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创作理念越来越成为共识。

### 三、“活的传统”与小说文体的本土化

新的思想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体,文学本土化的审美赋形,同样需要合适的文体来承载。在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体观念时,学者谢有顺说:“文体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现”,“如果我们承认,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意味着,文学与时代之关系的核心其实就是面对时代应如何说话的问题。说话即文体。当固有的说话方式无法再穷尽作家的内心图景时,他就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来重新处理这些内心经验”。<sup>②</sup>也就是说,只有借助文体的呈现形态,人们才可能得以窥见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的全貌。这提示研究者们,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的本土化探索不应该仅停留于主题呈现和话语建构层面,更需要深入到作家的文体自觉和相应的文体实践与美学探索中去。

#### (一) 传承与创化本土小说传统的三种路径

从总体上看,近年长篇小说对本土文学传统进行创新,探索文体本土化的努力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古典小说文体的袭用和改造。21世纪初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曾表现出袭用和借鉴章回体、传奇体、笔记体等古典小说文体结构的趋向。在近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不仅借鉴古代小说体式再度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潮流,而且这种借鉴从“50后”到“90后”等不同代际作家那里都有所表现。作家们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借鉴学习既指向某一种类的古代小说文体,又聚焦到某一部古代小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还通过对优秀的古代小说中某一人物形象或某一情节的创造性转换,复活了读者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情节的记忆,并将古典小说的情节结构与特定的时代情境和文化心理相结合。余华的《文城》在借用传奇体小说的同时创造性地对其进行戏仿,林祥福携女千里寻妻的主干故事不禁让人想到传奇小说中“千里寻夫”的故事范型,林祥福的棺木与所寻之妻小美的墓地戏剧性地并排在一起的情节设计,带有梁祝故事的某些影子;王安忆的《五湖四海》在借鉴传奇体小说的同时又发展了其独特的“反传奇”写作策略;叶炜的《还乡记》借鉴章回体分回标目的文体形式叙述赵寻根回乡的故事;等等。

第二,借用中国传统文学中其他非文类体例来创作小说。在分析21世纪长篇小说的文类并存现象时,雷鸣曾指出,21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跨文体的挪用”,即“借用中国非文学类的体例来结构小说”<sup>③</sup>。与21世纪前十年的长篇小说相类,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出现了借鉴非文学类体例的跨文体转向。其独特之处在于,作家们在继承既有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此前从未进入过小说的文类如何与小说叙事融通的路径。比如,王松的《热雪》将古代乐律十二律作为小说的文体结构;葛亮的《燕食记》主体构架借鉴宋词分上下阙的写法,在具体各章节又融入了诗词、经史典籍等要素;《烟霞里》则以中国古代话本小说“入话”的变体——两则“文前辅文”和一

① 王光东:《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地方性”问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16期。

② 谢有顺:《文体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现》,《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3期。

③ 雷鸣:《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本土化”的向度及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篇署名为“《田庄志》编委会”的前序——作为叙事的起点，同时借鉴溯源于《史记》等史籍的“编年史体例”，并在小说中融入了大量可以反映20世纪70年代当代中国历史纹理的社论、标语、杂志文章；林白的《北流》不仅用注、疏、笺、时笺、异辞等中国古典文献学术语作为小说的叙事结构，而且在小说主体部分之外，还有单独成册的“别册”和“支册”。由之可见，近年长篇小说以文类杂糅方式探索和实践中国小说文体的本土化，其间有对既往文学经验的传承，同时更显现出作家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新探索。

第三，“物学”传统与世情小说叙事的深度融合和创新性发展。世情小说源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于“人情小说”和“世情书”的指称，它是与神魔小说、话本小说等古代小说并置的文体类型，特点在于“记人事”以“描摹世态”。21世纪以来，随着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实践的发展，人们对世情小说的理解扩展了原初概念的外延。大体而言，世情小说可分为“生活世情小说”和“社会世情小说”两类，前者指称那些呈现普通百姓“生活流”的作品，后者指向与历史和现实的宏大主题发生关联的作品。<sup>①</sup>近年来长篇小说在本土化探索上出现了将回望“近历史”和观照现实的社会世情小说与“物学”传统相互融合的文体发展动向，这是作家们试图与本土社会生活和历史境况建立有机联系的新的叙事面向。比如，葛亮的《燕食记》创造性地借鉴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以饮食写世情”的叙事传统，在小说中融入了180余种能够体现中国饮食文化的食品，折射出中国民众对食物的认同和对以食为天的追求，“暗含着社会的太平和人心的稳定”<sup>②</sup>，并在其中对人情世态进行了细腻描摹。王跃文的《家山》亦是一部向传统侠义文化和乡绅文化进行文化探源的社会世情小说。作家在时间的自然流动中讲述中国故事和传达中国经验，建构了一个以名词“家山”为辐射中心的乡土世界，它不仅涵纳了沙湾、豹子岭、舒家坪、桃园、齐天界等以地理名词为表征的地域化的南方乡土世界，而且还包含了“枣红马、樟树、抱棚、糊米茶这一类的博物学名称”，“这些纷繁芜杂的名词，不仅构筑了一座词语的丰碑，而且也令‘家山’从一个蛰伏于王跃文心中的隐秘词语，具化为可以感知的鲜明形象”。<sup>③</sup>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也是一部融汇“物学”传统而实现社会世情小说创新性发展的作品。作家饱含深情地书写祁连山脉、昆仑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等中国山脉，藏獒、牦牛、马、狼、羊、旱獭、雪貂和马鸡等动物，以及红景天、点地梅、绒蒿花、旱菊、野苜蓿、虎耳花等西部草原特有的植物，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图景，更在充满诗性的“生活流”叙事中“刻绘出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汉藏文明相互融通与彼此成就的历史巨卷，揭示出文明共存发展的历史逻辑”，构筑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丰碑，让人看到“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灯向来不止一盏，而是四方皆灯，交相辉映”。<sup>④</sup>

## （二）文体本土化探索的文化症候与思想要因

近年长篇小说在文体上形成回归传统的本土化创作潮流，一方面与国人从文化焦虑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心态转变有关。众所周知，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作家经历了一个漫长地向西方借鉴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家多是以西方这一“他者”之“有”，映照出“我者”之“无”，其结果是本土的文化传统成为被批判和弃置的对象，文学自身也陷入对假想的匮乏之境的巨大焦虑之中。来不及对西方文学所强调的自由精神、个人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裂隙进行理性辨析，也来不及在反思后回到对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中来，便遭遇全球化思潮的席卷。当中国力图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确立自身位置的时候，中国作家愈加意识到自身独特性和主体性的阙如。为了纾解本土文化焦虑和摆脱文化认同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开始发掘本土文化传统，探寻从古典文体中寻求传达现代人

① 施战军：《当代世情小说之翘楚——范小青论》，《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1期。

② 陈泽宇：《葛亮：熬打历史的味蕾，以及文学的“盐”——关于〈燕食记〉研讨会的四个片段》，《中国作家网》2023年3月7日。

③ 叶立文：《词语创世和它的时间奇遇——评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中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④ 张晓琴：《点亮雪域高原的文明新灯——杨志军〈雪山大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思想变迁和心灵悸动的有效表达方式，致力于将其中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融入到当下的文学中来，以建构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随着国家层面对“文化自信”的强调以及本土化探索的推进，中国文学慢慢走出文化焦虑的心理状态，开始了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以及主体建构和确认的尝试。近年在长篇小说中，回归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民族形式，以传达中国人的情感和体验成为众多作家的自觉选择。

另一方面，文体本土化的多维探索，也与作家们破除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关。李震在论及近年新乡村叙事新变时指出，二元对立思维曾是几代作家的思维习惯，但随着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二元对立思维不断被化解，新乡村叙事才得以更新叙事范型和文化逻辑。<sup>①</sup>事实上，二元对立思维的破除也是近年长篇小说文体本土化得以实现的原因。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审美观念日趋多元，如若固执持守精英化的纯文学立场，热衷于进行文体实验，文学或将日益退居文化总体格局的边缘位置。与此同时，章回小说和传奇小说等古典小说曾在民间经久不衰的事实，也不断给予作家们启示，他们坚持探寻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和阅读期待与古典小说在民间生生不息的奥秘，打破古典与现代、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对本土性小说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在文体上大胆进行探索——或沿袭古典小说文体，或涵纳多种文体样式，或以“生活流”叙事展现普通人本真生活状态，其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审美期待，增强长篇小说的可接受性。

#### 四、近年长篇小说本土化探索的反思与展望

近年来长篇小说形成回归本土化的创作趋向，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建构文学主体性、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号召和文学自身寻求突破等多重原因密切相关。它对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形成、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建构以及文学与本土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有效连接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背后也潜隐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同样会影响到中国长篇小说的未来发展。

##### （一）本土化探索的缺憾与不足

具体而言，近年长篇小说本土化探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近年长篇小说在切近本土现实经验时存在同质化、程式化和简单化的倾向。这一缺陷在关于当下本土现实的书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体现为书写内容的同质化，也表现为处理方式的同质化和程式化。比如，很多作家在书写近年乡村的嬗变时，多是从经济视角切入，或呈现乡村在企业的帮扶下发展大农业实现了经济上的振兴，或通过发展旅游改善了经济面貌。这种处理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乡村振兴中伦理、文化和人才上的振兴问题，忽略了乡村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也简化了乡村振兴的复杂性，遮蔽了中国乡村现代化探索经验的丰富性。这就导致真正深度反映“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深入历史现场的作品还不是太多。再如，21世纪以来，乡村世界在经历第三次文化裂变后，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发生了变化，但文学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以旧有的文学经验对之进行审视的问题，没有深度把握中国乡村所发生的巨变。

其次，对具有人性深度和体现中国人独特文化心理的人物形象的开掘有所欠缺。诚如学者王春林所指出的，“能否在小说中塑造出若干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来，依然应该是衡量该小说作品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所在”<sup>②</sup>。可以说，独特的人物形象既是长篇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样式的一种本质规定，也是显示作家艺术水准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近年的长篇小说中，具有人性深度和彰显本土文化内质的典型性人物不仅与长篇小说的数量不匹配，而且其深刻性也不如21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中诸如《秦腔》中的夏天义、《生死疲劳》中的洪泰岳和蓝解放等人物形象。实际上，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国人的物质追求和精神向往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缺乏真正具有灵魂深度的典型人物形象，未能呈现出中国百姓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复杂的心理体验和丰富的精神追求。

最后，缺乏超越意识和未来意识。本土性文学的生命力一定意义上体现为对时代和现实功利的超越、

① 李震：《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② 王春林：《繁荣中的沉潜与拓展——对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描述与判断》，《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



对人类普遍命运和精神困境的关怀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开掘。鲁迅、沈从文等前辈书写本土生活的作品之所以在当下仍然魅力不减，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笔下的人情物事虽然极具地方文化色彩，却呈现了中国特定的文化结构及其特征；同时，他们在书写这些生长于地方的人情物事时，背后有立足于时代却又超越时代的新理念——启蒙主义和反思现代性的理念——作为支撑<sup>①</sup>，使得其作品超越了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限制，具有抵达世界性的人类关怀的品质。较之前辈作家，尽管很多作家都有创作出具有超越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作品的明确意识，但具体实践却不尽如人意。比如，很多作家都深刻地认识到要以一种更为“地方性”和“本土化”的方式通达“世界性”，但当在小说中融入大量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元素时，却因拘泥于现实生活的细节呈现，缺乏独立而深刻的文化思想与价值理念作为支撑，致使极具地方色彩和文化意蕴的要素仅仅成为小说叙事的点缀，没有与小说人物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等深层因素较好结合，导致作家很难超越地域限制，未能深刻呈现人类面临的具有共通性的生存和精神困境。

## （二）本土化探索的未来进路

长篇小说的本土化探索关涉到当代文学把握本土现实和切中当下中国之变的精神向度与审美境界，未来它想要在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所突破并找到发展进路，须摆脱目前本土化探索潜隐的内在缺憾，在多个维度进行拓展和深化。

其一，拓展文学表现本土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文学本土化的本质规定之一，在于它与本土生活和文化的密切关联。在此意义上，未来本土化文学意欲实现与本土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深度关联，需要作家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视野下全方位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新变，将关注的焦点拓展到与中国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揭示出本土生活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比如，本土化文学未来可以进一步开拓与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电力行业、医疗行业、交通运输行业、新媒体与通信行业等方面的题材，还可以呈现生活于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文化积淀的民众的多元生活和价值观念差异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碰撞与融合。除了拓宽文学对本土生活的表现范围，开掘生活的深度也是必要的，它强调本土文学须深刻地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深度揭示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理。对此，作家们一方面需要真正践行深入生活和扎根生活的创作理念，有介入现实和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和反思性的态度，能够透过生活的表象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变迁有深层的思考，最终直抵民众深层的精神世界，透视时代文化心理。

其二，讲好契合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故事。这里首先涉及本土化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理解问题。也就是说，本土化文学需要深入思考何种表现形态的文化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大致而言，强烈的家国意识、积极入世的精神、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崇尚公平正义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如何影响中国式现代进程中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是未来本土化文学应当着力表现的对象。在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本土化文学要讲好彰显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故事，还需要正确处理文学之道与文学之器的关系问题<sup>②</sup>。经过先锋文学以来作家们对艺术表现形式的热忱探索，各种新奇的艺术表现形式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兴奋点所在，未来本土化文学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是正确处理道器问题和质文问题，在文学之道与文学之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有效整合本土化文学的精神内质与艺术形式，避免艺术形式与文学性和精神内质的脱节。

其三，塑造真正贴合本土生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性人物。诚如阿来在谈到好小说的标准时所指出的，优秀小说的标准之一是“有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这样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于某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sup>③</sup>。小说中的人物不仅承载着某种社会历史蕴涵和时代情绪特点，也寄寓了作家对人性人情的认识和思考。这提醒未来作家，应当摆脱典型人物形象贫乏的缺陷，适当将关注

① 吴义勤：《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趋势与异质性书写》，《东吴学术》2023年第6期。

② 贺仲明：《传统文学继承中的“道”与“器”》，《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

③ 阿来：《好的小说的两个标准》，《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以人物的形象性、典型性和深刻性传达出中国民众深层的人性世界，揭示时代的精神气质、情感结构和文化心理。小说终究是关于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学问，文学的现代化最终追求的也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过程中人的存在状态和精神世界，人如何认识自我，如何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均须通过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来呈现。

其四，更新对本土传统的价值认知观念，以现代意识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其进行传承、创新和发展。有论者指出：“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sup>①</sup>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发展并非要抛弃传统，而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从中国本土传统和民族文化中发展出来的现代化，它强调现代化与传统的一脉相承，也强调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中华优秀本土传统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就此而言，未来本土化文学要在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格局中彰显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必然需要着力传承、创新和发展本土文化传统。故此，作家们需要更新对本土传统文化的价值认知，辩证地对待本土文化传统，以现代意识和开放、科学的态度甄别和选择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传统，充分发掘、阐释和倡扬其正向价值。同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契合媒介形式的变化和人们审美方式的变迁。

## A New Approach to Exploring of Literary Loc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Study on the Creation of Recent Novels

PENG Lan-jia & HAO 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trend in novels towards a return to localization in themes, linguistic forms, and stylistic changes, becoming a path for the literary field to practic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pecifically, this is reflected in writers not only revisiting history and reflecting on reality at the thematic level to expand and deepen their experiences with localization but also borrowing from local linguistic resources in language expression. This aims to restore the unique rhetorical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portraying the emotion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Additionally, writers are actively exploring stylistic innovations by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ocal novel structure. This trend towards localizing cre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promo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literary pursuit of original breakthrough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is exploration of localization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homogenization of themes, simplification of handling methods, lack of rich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lack of transcendence. In response, writers need to deeply immerse themselves in life, update experiences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new changes in China's local reality, and expand the focus to various aspect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They should draw inspirat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of local traditions in China to create more characters with profound humanity and to exemplify the core of local cultural spirit.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 transcendent perspective and future consciousness to address the existential dilemmas and spiritual challenges of humanity,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valu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localized manner that transcends "universality".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digenization of Literature, Chinese Story, Chinese Subjectivity, Stylistic Innovation

[ 责任编辑：廖霞、谢雨佟 ]

<sup>①</sup> [美] 西里尔·E. 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8页。